

誰說國人好賭

楊繼良

我在國內和在美國，都聽說過「中國人好賭」的評價，這話是同胞們自己講的，根據有幾個，其一是國人閒來喜歡搓麻將。老外也有喜歡打橋牌的，但他們雖然按輸贏計分，「結算」時一笑了之；而我們則一定要講個錢財輸贏，否則就覺得索然無味。我一個近親來美國後，十多年來每天搓麻將，有點「嗜賭」的味道。但十多年前，她已七十多歲，在美國以補充社會保障收入（SSI）維生，終日無事，以此消磨時間、結交同好，倒也是防止老年痴呆的好方法。國人退休得早，婦女尤其，有大把時間和精力需要打發，近來看到廣場舞在全國流行，甚至跳到紐約來了，而搓麻將也是一個打發時間和精力的好辦法，可見搓麻將未必就能證明國人好賭。

其二，中國沒有賭博場所，美國有，如果到他們的賭場，一定會發覺華人面孔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當地華人的比例。雖然沒有找到具體的人口統計數字，但因賭場裏觸目所見華人的比例，比按常識判斷的人口中華人的比例超過很多，所以不容置辯。再者，某些國人會把「賭」看作是人生享受之一。但賭之為害，可以在周圍的親友中看到。我跟老外接觸不少，而且接觸的多是知識分子，沒有聽他們講起有好賭的老外，想來老外好賭的，一定少於國人。但對把去賭城者多作為「華人好賭」的根據，我持保留態度。

二十七年前我住在加州時，曾去過一次賭城。我初到美國，連輛二手車都沒有，不可能像一般老外家庭周末駕車外遊，訪問賭城遂成為唯一的娛樂活動。那是賭場組織的，每人收費二十美元，其中十美元是到達時他們發給代價券，作為賭資；傍晚供應自助餐，是免費的。扣去賭資代價券後，淨成本十美元，包括了來回交通費和一頓「開懷痛吃」的大餐，值！那次一起去的都是華人，但誰都沒有參賭，那十美元的代價券

，硬是都在回家前「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倒是那個「大餐」，我們都是中午沒有吃飯，下午餐廳一開始營業（大約是三點鐘吧）就報到，充分享用之餘，還偷偷地夾帶幾個麵包回家。賭場以「代價券」為誘餌，期望大家「按捺不住」，但同行者中沒有人上這個當的，可見「中國人好賭」並不成為「定律」。我相信在賭城所見的華人中，必有許多跟我們一樣地以此為「消閒去處」者。有一次在華語電視節目中，看到在美國的同胞笑談假日何處去時，脫口而出說「那就去賭城吧」，不禁作「會心的微笑」。

但也有少數人認為自己有「賭則必勝」的把握而去參賭的。我的一位老同學年近六十來到美國後，因為有嚴重的糖尿病，不能像我一樣去打工，卻認為自己懂數學，有必贏的把握，每天去賭城報到。後來我問跟他熟識的一位退休華人廚師，究竟輸贏如何。老廚師笑答，那還不是「十賭九輸」！這是中國人的經驗，要比任何數學「理論」都靠得住。我們寧波人有一句順口溜說「賭，全空」，此之謂也。

我的結論是，中國人初來美國，生活拮据，去賭城消遣者多，但未必是「好賭」的證明。賭城有許多聲色犬馬的演出，成為引誘大家去的「亮點」。所以國人來到美國，必去賭城「一開眼界」，否則有負此行。逢年過節，華人常以「去賭城」為消閒內容，因為那是在國內找不到的。賭城的旅館和餐飲價格便宜，這是老闆用來吸引顧客的「銷售方針」。平均來講，初移居美國的同胞們相對比較窮，「貪便宜」確有可能。由此而得出「中國人好賭」的結論，則是「想當然耳」。

一次回國途中，遇到一位從塞班島轉機的中國青年女工，她說島上工人全都來自中國。有一個華人開了個小賭場，引誘工人周末去參賭，許多人的辛苦錢都被這樣騙走。她說，工人離鄉背井，生活寂寞；加上總有些僥幸心理。我覺得她講得很客觀，歸納成「國人好賭」，就過分了。

周家的悲劇

魯 人

魯迅與二弟周作人的恩怨，世人各有說詞，但怕注定要成為永恆的謎。成謎的原因是所有當事者皆終生緘默，未吐半字實情。外人雖也看出一二，卻終無任何口供做鐵證。自然，如今再糾纏於此中是非已於事無補，只是這由兄弟恩怨造成的家庭悲劇，並殃及無辜的周氏後裔，實在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一件令人扼腕嘆息的事。

從周家祖孫三代遷入北京八道灣大院，似乎就注定要經歷這場悲劇。全家同住一個屋簷下，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這是周母的願望，也是魯迅和周作人對三弟周建人的承諾。當初，三弟想學兩位兄長一樣外出求學，被母親固執地阻止了。魯迅改變不了母親的意志，為了安慰渴望上學的三弟，便與二弟一起承諾將來兄弟三人永不分家。然而，搬到北京不到兩年，一切便都破滅了。沒有學歷的周建人，在北京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收入低而且不固定，時間一長便受到二嫂羽太信子的白眼及冷言冷語，而他的日本太太羽太芳子也受姐姐信子的影響，對他也輕慢冷淡起來。最典型的事例是，一次，周作人及羽太姐妹乘車外出遊玩，周建人也想去，芳子卻冷冷地說：「你也去嗎？」車上的二哥夫婦對此則視若無睹，聞若未聞，一言未發，讓周建人感到冰冷徹骨。不知周建人是否因此下了離家的決心，但必定是許多類似的事，迫他離開了家門。一九二一年九月，周建人南下上海，由魯迅託人介紹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由此開啓了周家悲劇的大門。這件事將造成的後果，周作人怕是沒想到，羽太姐妹則不屑理會，只有魯迅在三弟臨走前叮囑道：「你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麼容易再進這個家門，你在外謀生，自己存些錢，不必寄錢回來。」看來，敏感的魯迅已預感到八道灣空了的不祥。雖然，大哥再三叮嚀，老實的周建人卻仍對未來滿懷憧憬。在上海生活稍安定，便多次希望芳子攜子女南下與他團聚，但都被芳子拒絕了。信子不想讓妹妹離開自己，芳子也不想跟丈夫到上海吃苦。魯迅的預感很正確，很快他也被逐出了八道灣。許廣平曾回憶：「有時茶餘飯後，魯迅曾感嘆過自己的遭遇。他很淒涼地描繪了他的心情，說

：『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談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病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裏開出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周家的悲劇，應該與信子有很大關係。魯迅對信子可能早有不滿，這從魯迅日記中可找出些蛛絲馬跡。魯迅日記中最後一次出現信子的記錄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那天，已搬出八道灣的魯迅回去取自己剩餘的物品，周作人夫婦「突出罵詈毆打」。其實，魯迅日記中真正意義上最後一次關於信子的記錄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九日。這日魯迅與二弟全家出外遊玩了一天，其間發生了什麼不得而知。也許這天信子的某些言行，使敏感的魯迅很不愉快，甚至反感，並驗證了之前在紹興時的一些耳聞，從而產生了不祥的預感。以後，除一九二四年那次，日記中再未對她着過筆墨，而日記中關於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和弟弟羽太重久的記錄則延續了一二十年。

周家遷居北京後由信子管家，應該也是注定發生悲劇的一個因素。許廣平曾說，信子是「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隸主」。話雖激憤，卻也反映了信子生活中的貪舒適，不節儉，且無度的不良習慣。周建人回憶在北京時，日常物品信子專用日本產品，更有甚者有時飯菜做好，她突然想吃餃子，一桌飯菜撤回廚房，另包餃子。周作人一生常以借債度日，應該與信子有很大關係，這從周作人一九六〇年的三則日記中即可見一斑。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結本月用款計逾五百八十餘元矣。」十月二十九日：「擬減少傭人，家內不能通過，只得任之，甚感不快。」另一則日記記錄了付傭人報酬的數額：「黃媽往勞動十五日，給糧票十五斤，油票五兩，款三元也。」據陳明遠的《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一書中記錄，當年，城市職工年平均工資為五百餘元。可見周家花費之高，已讓周作人着實吃不消了。但想裁減傭人，卻遭到「家內」信子的堅決反對。可見傭人出身的信子，享受起來倒讓少爺出身的周作人都相形見绌。八道灣由這位日本太掌管，學慣是必然的，出矛盾也是必然的。（一）

有人把哈佛大學所在的波士頓，概括為一路兩校和龍蝦，即美國人民的自由之路，世人仰慕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和令人垂涎的波士頓大龍蝦。那時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初到美國的中國人都首先忙於生計，顧不得認識社會和參觀遊覽。我們得益於哈佛燕京學社一開始就帶我們去參觀和郊遊。在波士頓金秋的十月，我們參觀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列克星敦，遊覽羅德島的雲石山莊。郊外的楓林美極了，山坡峽谷、房舍湖邊，目之所及盡是紅色和金黃色。先複習一下美國的獨立戰爭史吧，看看自由之路的意義何在。

打個比方，中國人說起革命聖地，會想起延安和井岡山，美國人呢，那就是波士頓了。波士頓，是歐洲人最早登陸美洲大陸建立起來的城市之一，是美國最古老、最具有

關於香港中小學功課繁重的問題，多年來一直是社會話題，各種說法糾纏不休，而最終「吵歸吵，功課卻越來越多」。

功課多的原因在哪裏？是學校硬性規定的嗎？似乎不是，因為要是學校把功課量減下來，家長們會抗議：為什麼別的學校功課那麼多，我們的孩子功課那麼少，這麼少的功課，怎麼可以保證孩子考出好成績？這樣看來又似乎是家長的壓力，可是家長也叫屈：每天陪孩子做功課做到三更半夜，自己還要上班，還要做家务，他們還巴不得功課少一點呢！但學校布置了那麼多功課，不完成又不行，你有什麼辦法？

那麼是政府規定的嗎？政府當然也不承認。是學生自己主動要求的嗎？那更荒唐了。能影響孩子功課多寡的，也就這麼幾方「持份者」，大家都不承認自己施加壓力，那麼壓力從何而來？

說到底，自然又是社會的錯，社會是抽象的概念，沒有人需要對社會的錯負責，因此歸咎於社會是最方便卸膊的了。

誰提議把功課減下來，誰就要面對不同「持份者」的質疑，誰就要對隨後可能出現的合格率、升學率低落負責任，試問有誰會做這種「損己又不利人」的事？

最近有社會人士提出倡議，主張小學生無功課，這個提議可謂大膽，但提議者恐怕也明白這是個「偽建議」，因為除了學生之外，沒有人會贊同他的「無功課」倡議，學校、老師、家長，甚至政府，都只當笑話聽。既然太難地，當然也只能歸入「偽建議」之列。

但「無功課」之提議，對幼稚園小朋友來說，卻是切實可行的建議。幼稚園小朋友每天返學以唱歌遊戲為主，培養一些生活情趣，知道一點生活常識，學習一點

聖地與豪宅

歷史文化意義的地區之一。波士頓地處美國東海岸的馬薩諸塞州，它的西郊有一個小鎮叫列克星敦，我們熟悉的「列克星敦的槍聲」就是在那裏打響。槍聲之意，是一宗事件的代名詞，指美國獨立戰爭的開始。那場起於一七七五年，長達八年的戰爭，最終以美國的獨立，和英國人在北美的殖民統治結束而告終。八年，很好記，你可以聯想到中國人的八年抗戰！美國人把列克星敦當作獨立自由的象徵，稱之為「美國自由的搖籃」，並在那裏樹立獨立戰爭紀念碑。碑座上塑有一位列克星敦的武裝民兵，頭戴草帽，手握步槍，英姿颯爽。碑下刻有銘文，大體意思是「堅守陣地。在敵人沒有開槍射擊以前，不要先開槍；但是，如果敵人硬要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那麼，就讓戰爭從這兒開始吧」。看見那座雕塑，你會想起中國的南昌，想起那句「南昌起義一聲槍響」；看見那段銘文，你會想起中國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及我們中學語文課本上關於

功課設上限 讀書要放鬆

顏純鈞

與他人相處的好習慣，這已經夠了。幼稚園無功課，這是完全合理的。現在的幼稚園不是無功課，而是功課多得令人咋舌，很多小學課程「下放」到幼稚園去了，小朋友學中英文和數學，未升讀小學前，幾乎都已具備小學一年級程度。

要讓幼稚園無功課，只有政府硬性規定才能做到。你要指望幼稚園自己約束，或指望家長主動提出無功課要求，那無異於與虎謀皮，因為任何一間幼稚園、任何一個家長，都有「孩子考不上好學校」的擔憂，別人的孩子早已中英數俱佳，你的孩子卻只會唱歌遊戲，那就一定「輸在起跑線上」，一到報名測試就要落荒而逃，還指望升上名校？

但如果政府從「人道立場」出發，站在保證幼兒身心健康成長的道德高地，一錘定音，規定幼稚園不准有功課，全香港公平對待，有偷步秘密布置功課的，施以行政處罰，那時一舉消滅幼稚園的功課，還是做得到的。當然，家長接孩子回家後，會不會又去參加這個班那個班，那就沒辦法控制了。做父母的不給孩子一個快樂童年，別人有什麼辦法呢？全香港幼稚園都沒有功課，都以唱遊為主，入學試時，各小學也自然有另一套收生標準，你懂了很多生字，但個性發展方面問題多多，也未必有什麼優勢。

冀由政府訂定規矩

至於小學，完全無功課也不太合理，因小學畢竟要教不少知識，那些知識又是繼續升學的基礎，不能蒙混過關，要有適當練習，使知識能扎實鞏固，因此小學不能完全沒有功課，但小學應該規定一個功課數量的上限，這方面，又只有政府出面才好說話。

這個上限如何規定？政府可以邀請一些教育專家、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代表一起討論，比如每天以不超過六項功課為上限，低過這個標準沒問題，但不能高於

革命戰爭的文章。看來各國人民都用同樣的手法來描述，描述自己國家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

雲石山莊，這個位於羅德島的豪華莊園令我大開眼界。羅德島一帶雲集了美國歷史上一些風雲人物的豪宅，雲石山莊算是最典型的一個。山莊是美國蒸汽船和鐵路大亨范德堡（Vanderbilt）家族的夏日度假別墅。據說范家的財富曾一度超過整個美國的財富。別墅採用大理石建造，內外奢華，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奢華的建築」。當時造價為一千一百萬美金，其中七百萬用來購買五十萬塊方形大理石。竣工後，范德堡將山莊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三十九歲的妻子Alva。後來范德堡與Alva離婚了。范德堡去世後，Alva重新開放雲石山莊，並在海邊山崖搞了一個中國茶館，經常在那裏舉辦婦女權利的集會。雲石山莊後來改為博物館，開放給公眾參觀。

（哈佛散記之二，逢星期三刊登）

這個標準。六項功課大約可以在兩個鐘頭之內完成，在學校可以做一部分，回家再做一部分，那樣學童便會有較多放鬆和娛樂的時間，可以到公園跑步、踩單車，也可以玩足球、羽毛球，或自己學一點樂器，看一點課外書，至於玩遊戲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

讀書苦，是這年頭孩子們的普遍抱怨，童年都活在沒完沒了讀書做功課的陰影下，性格的成長會不平衡，日後也未必有出息。由政府訂定規矩，每日功課有個上限，這樣學校可遵循，家長不會擔憂，學生又得到喘息，所有孩子都在同一個功課規限的框架下一視同仁，大家同在一條起跑線上，是龍是蟲，各自發揮就是。

至於中學，功課當然還是要，中三以下，仍可以規定每日的功課上限，到了中三以上，學習最要緊靠自覺，即使老師不布置功課，也要自己想辦法去溫書了。做功課所為何來？就是溫書，如果你懂得自己溫書，那不做功課也沒問題，反之，功課都完成了，但都不入腦，那也是白做。此外，主動吸收各種課外新知識（在資訊爆炸的今日，課本上的知識很容易就過時），注重人格方面的自我完善，那也是很重要的。總之到了中學，學生應該有足夠能力拿捏自己的功課，懂得了就少做，不懂的多做，老師布置了功課，學生可以不做，不必因為功課而增加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除了書面功課，學校可以安排更多探討和辯論，以生動活潑的形式讓知識更鞏固，思想更活躍。

政府規定小學和初中的功課上限，是從愛護孩子身心健康的角度出發，又經過深入的討論，應該會得到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沒有任何社會角色有如此的底氣和執行力去做這件事。

為功課繁重這件事，香港已經吵了幾十年，再吵下去還是不會有結果，不如政府快刀斬亂麻，一招定江山。

以色列節日何其多

陳來元

定為節日，叫普爾節。普爾節是個歡樂的節日，全國放假一天。這一天，劇院通常上演有關這一故事的戲碼。人們，特別是兒童，還穿上誇張的服飾、戴上故事中有關人物的面具參加晚會，因此也有人稱普爾節為化裝節、狂歡節。晚會上，人們通常吃一種特殊的三角甜甜，這種甜甜象徵着那個波斯惡官的耳朵或帽子。

誦經節在住棚節的第八天，為猶太教的重要節日之一，是為慶祝猶太人獲得猶太經典《托拉》聖卷而設的。猶太教徒誦讀《托拉》聖卷通常要一年時間，誦經節就是慶祝讀完《托拉》並重新開始新一年誦讀的



在普爾節，兒童會穿上誇張的服飾參加晚會
網絡圖片

節日。此節日宗教氣氛濃厚。《托拉》聖卷平時都是存放在神聖的櫃子裏的，在誦經節慶祝儀式上，一個必不可少的節目就是從櫃中取出《托拉》，每個男人都要輪流着手抱聖卷圍着讀經台走七圈，並跳舞。晚上舉行祈禱儀式時，人們還要抱着聖卷到室外跳舞，使街上的每一個人都可體驗到節日的歡樂氣氛。在節日裏，人們還要祈禱，主要是祈求來年風調雨順。

誦經節是歡樂愉快的節日，人們（主要是教徒）不但要唱歌、跳舞，還要吃甜食。兒童會獲得糖果和印有節日標誌的小旗。

燭祭日也稱大屠殺紀念日，在猶太曆尼散月（西曆四月）二十七日。為紀念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慘遭納粹殺害的六百萬猶太人和勇敢抵抗納粹屠殺的猶太英雄，以色列議會於一九五一年通過法令，確定猶太曆尼散月二十七日為大屠殺紀念日，但此日不放假。

從大屠殺紀念日前夕至次日晚上，所有餐飲行業和娛樂場所都停止營業，在大屠殺紀念館及全國各地舉行紀念活動。總統、總理、議長等重要人物到大屠殺紀念館悼念遇難者，慶祝猶太民族的生存，並出席群眾集會或遊行。大屠殺幸存者及其家屬會燃起蠟燭，追念罹難的家人和親朋好友，許多猶太人還到大屠殺紀念館向遇難者獻花。當天上午十時，全國鳴笛兩分鐘，國民停止一切工作，並起立為死難者默哀；全國降半旗，電視台和電台節目報道相關紀念活動。節日期間，全世界的正統猶太教便要禁食一天，家家點燃蠟燭，誦讀猶太經卷《卡迪什》（為死者祈禱的經卷）。（四）